

国学家与教书先生

——梁启超晚年在清华的学术生活

► 黄湛

近人为梁启超作传，一般根据其政治活动、学术思想，将梁氏一生划分为四个时期，每个时期都有特殊的贡献与影响。第一期自万木草堂到戊戌变法，是“通经致用”时期；第二期为立宪请愿到辛亥革命，是为介绍西方思想，并以新方法批评中国传统学术时期；第三期为参与内阁、兴师讨袁至欧游以前，是为“纯粹政论家”时期；第四期为入校讲学、专力学术时期。

文献与德性：治国学的两条大路

来到清华国学研究院（下简称“清华国学院”）之前，梁启超正筹备办一所“文化学院”，培养国学人才。最终因缺乏资金，未能成事。清华国学院的办学宗旨与他一直以来振兴国学的想法不谋而合，故当即应允国学院的邀请。

1923年初，曾有一个清华学生前往天津，告诉梁启超清华学生苦于无人指导国学，并向他请教哪些学者可堪清华国学导师之任。梁启超则告以无人可选——如此回答，是由于梁氏认为学问渊博者多，但教育未必得法。

他心中实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教育理念，按照他自己的话也可以理解成：一种科学的教育方法。这套方法早先呈现在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》中。这是

梁启超1923年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的一次演讲。他指出，治国学应遵循“文献的学问”和“德性的学问”两种门径。其中，“文献的学问”运用客观方法加以研究；“德性的学问”则通过内省和躬行的工夫来完成。科学方法和道德修养是梁启超晚年提倡的并行的学术宗旨。

他在给清华国学院学生做演讲时，对这一学术宗旨做了更明确的说明。

梁氏坦言自己到清华国学院任教，是要借以实现教育理想和抱负。自从新文化运动鼓吹“德先生”与“赛先生”（民主与科学）以来，中国传统学术——特别是儒家思想——成为封建、愚昧的代名词。梁启超试图打破这种偏见，一方面强调应在学术研究上秉持科学方法，“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”；另一方面，身体力行，宣扬磨砺人格的重要性，希望与一班弟子共建国学的精神，“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”。

在那些受其启蒙的“新青年”看来，梁启超竟落入文化“保守”的窠臼。但是，与当时从未涉足欧美大陆、未尝了解西方文化的“旧派学者”相比，梁启超实在不能算是“传统知识分子”。三十年前支持变法改革时，梁启超就以介绍西洋文化为务，启蒙思想，创造新民。只不过在详细了解西方文明之后，梁启超对本国文化的感情更为加深，甚至不



梁启超（1873～1929），字卓如，号任公，又号饮冰室主人。

讳言：“只要旧的是好，守旧又何足诟病？”他所谓的好与坏，取舍标准不在于本国传统还是舶来品，而在于文化价值本身。

他观察到，当时全世界正处于“怀疑沉闷时代”，中国在精神和智识方面都足以贡献全人类。西方科学固须重视，但不应妄自菲薄，鄙夷传统文化。知识分子在任何时期都应保持头脑清醒，偏执的守旧或者盲目的崇洋媚外，都不是客

观科学的态度。值逢举国崇尚西学，趋之若狂之际，梁启超即以发明整理本国学术为自己应负的教育义务。由于对本国文化抱有充分自信，故其从事研究，方能投入完全的热情和精力。也只有纯粹的不计个人名利的教育信念，才能不惧怕受到万众的非议以及自诩进步知识分子的诬蔑。

梁启超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，教育事业非他一人发宏愿即可促成，必须集合相当学力的同志，培养热心兹业的青年，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。事实上，直到去世，梁启超一直都在贯彻这一理想，为此孜孜不倦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
梁启超所划定的“两条大路”，在他日后执教清华国学院时，完全展现在课程讲义和指导研究中。历史是“文献的学问”中“最浩博、最繁难而且最有趣的”，也是他晚年投入最多的研究领域。至于如何研究历史，他认为应借助中国丰富的文献史料，加以西方的科学方法。梁启超在1922年即已完成《历史研究法》这部名著，几年后到清华及其他学校，又陆续开设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”“中国文化史”“历史研究法”“读书法及读书示例”等课程，这些讲义稿后来都刊行成书，成为梁氏晚年学术著



梁启超主笔或创刊的报纸

作的主体。在国学院任教时，梁启超又设立中国文学史、中国哲学史、宋元明学术史、清代学术史、中国史、史学研究法等研究领域，供学生选择专题完成指导论文。

针对“德性的学问”门径，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，除了平日演讲中不厌其烦地宣扬道德修养的重要性，还专门系统讲授“儒家哲学”一课做理论的说明。在梁氏看来，人格修养不仅是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且是“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”。

来到清华：既开风气又为师

1925年，清华学校成立研究院国学门，简称“清华国学院”。聘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、李济为导师，五星聚奎，盛比鹅湖。梁启超讲儒家哲学、历史研究法等课，又在大学部讲中国文化史，同时为燕京大学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，实为一生用力最专、治学最勤、写作最富的时间。

清华大学始建于1911年，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成为中国著名高等学府。1925年2月，吴宓出任清华国学院的筹备主任。他赶赴天津，亲自谒见梁启超。一番洽谈之后，梁氏即表示“极乐意前来”。

清华学校坐落于北京西郊，其中体育馆、图书馆、科学馆和大礼堂为近代著名建筑。园内旧有建筑则有工字厅及古月堂，后临荷池，石山起伏，松柏环绕，名曰“水木清华”，位于东侧的清华学堂，即国学院师生上课讲学之地。梁启超执教清华后，入住于北院2号。北院在当时是校内造价最高、设备齐全的别墅式洋房，建校之初专为外籍教师居住，故又有“外国地”或“小租界”的别称。梁启超任教的年代，只有国内极少数最有声望的中国学者才有资格居住，可见清华对梁氏的重视。

梁启超与清华渊源颇深，早在1914年，梁启超就假借清华学校著书，清华校训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亦来自梁氏本年在清华演讲的启发。其中，梁启超勉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，培养“完全人格”，做“真君子”。

1925年9月9日，国学院第一期正式开学。开学典礼于上午举行，下午全体师生到工字厅举行茶话会，会议由吴宓主持，梁启超、王国维、赵元任、李济四位导师相继发言（时陈寅恪尚未到校）。在学生的要求下，梁启超额外做了《旧日书院之情形》的演讲。之所以在新式大学的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讲“旧日书院”，实是看到大学授课制度基本上只专注智识的培养，缺乏传统书院对个人修养的重视。梁启超在一年后的国学院茶话会上，再次表达了相近的观点：“我们觉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，想照原来书院的办法——高一点说，参照从前大师讲学的办法——更加以新的教育精神。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，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。”

每于暑期将近时，梁启超还会约学生同游北海，“俯仰咏啸于快雪、浴兰之堂”。1923年，为纪念



饮冰室外观，中间窗子为梁启超的书房，摄于20世纪30年代。

蔡锷将军的“倒袁”功绩，快雪堂成为松坡图书馆的馆址（蔡锷字松坡），与蔡锷有师生之谊，且参与“倒袁”的梁启超任该馆馆长。不仅如此，快雪堂还曾是梁启超在北京城内的一处居所。他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就提及，自己一周之间一般在清华住四日，其余三日则入城住在松坡图书馆。北海公园及松坡图书馆直到1925年8月才正式对外开放，此年恰逢清华国学院成立，快雪堂不仅是梁氏师生的雅集场所，还偶尔邀请名师讲学其间。

欧游归国后，梁启超频繁游走于各大学和文化机构中间，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。清华国学院则如“理想的实验场所”，梁启超可大展拳脚，与吴宓、王国维等志同道合的学者，一同来实践他的教育理念。他曾告诉学生，学校本就是个“社会”，与朋友如何相处以至一切应接事物，均是用力磨炼人格的机会。至于他自己，在传授知识、指导论文外，用言传身教的方式，希望学生受到他的熏陶感染：“对于诸同学，我不敢说有多少人格上的感化，不过我总想努力，令不至有若干恶影响到诸同学。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、谈笑、各种琐屑的生活，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学们相当的暗示或模范。”梁氏希望教导出一些具备道德人格的知识分子，由这些个

体出发，进而感染身边的人。此种方法实际上正是《大学》讲求的修身以治世的为学途辙。

“听讲不如读书”：学生眼中的大师课

梁启超文满天下，名声斐然，晚年落志江湖，游迹讲堂之间，不仅文科生，理、工、农、商科学生和不少社会人士都会慕名前来听课。很多时候连过道也挤满了人，甚至有踞于窗槛一睹风采者。他们都怀着崇敬而好奇之心，想要看看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的文豪，究竟会带来怎样不同凡响的课堂？

第一印象总是外貌上的：五十余岁的梁启超上课常穿着青褂长袍，衣履朴洁，他的样貌不甚出众，短小精悍，发秃如镜，呈苍老态。但目光如炬，奕奕有神，“步履稳健，风神潇洒，左右顾盼，光芒四射”，令人记忆深刻。他讲话时严肃而诚挚，手势和表情十分丰富，笑声爽朗。但有的回忆，则区别于那种文质彬彬的印象，形成一种反差：“下午的课常迟到五分钟，走上讲台，匆匆忙忙，面红耳热，呼吸喷出酒气。第一、二时中间的十分钟休息，全部用于吃烟，他的烟瘾很大，一空闲就摩挲烟盒，连手指头都熏得黄黄的。”

梁启超讲课有时像说书艺人，手舞足蹈，酣畅淋漓，别具一种感染力。他所征引的作品大部分都能背诵出来，熊佛西曾把梁氏讲课的情景描摹得绘声绘色，他说：“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，或戏剧家表演：讲到幽怨凄凉处，如泣如诉，他痛哭流涕；讲到激昂慷慨处，他手舞足蹈，怒发冲冠！总之，他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，使听者忘倦，身入其境。”

据梁实秋回忆，有一次梁启超讲授古乐府《箜篌引》，那是写一白首狂夫渡河而死，其妻遂援引箜篌而歌，其声凄怆，曲终投河殉葬的故事。梁启超上课的情景令梁实秋印象深刻，以至二十余年后，自己偶然在渡河时，“但见黄沙弥漫，黄流滚滚，

景象苍茫，不禁哀从中来，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”。

然而，很多人的记述却与梁实秋的说法恰恰相反，他们被梁启超的新会口音困扰，一节课下来，大部分内容难以明白。梁启超不仅自己不携书本，亦不发讲义，只口授大意，让学生笔记。学生们不得已，只好下课后群趋粤籍同学处借抄笔记。除了口音问题，梁启超还缺乏流利明白的口才，在说话时常加上“啊啊”“这个这个”，语讷讷不易出口，使人怀疑他患有口吃。

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董事时，开设“中国文化史”课，据说开学时听者多达一两千，要在“风雨操场”上开课。但几次开讲后，来听课的人就越来越少，只有一百个左右，便挪到教室里进行。实际上，旁听他课的人，很多来一次或几次就被“劝退”了。虽然梁启超自己要背负一部分责任，但更大程度上，很多人只是想亲眼瞻仰梁氏的丰采，或者来评判一下这位大学者是否名副其实。满足了好奇心，便不必再受“不知所云”的煎熬。这大概是“名人效应”引发的必然结果。

梁启超对这一状况心如明镜，他清楚地知道：“他们不是要跟我作学问，只是要看看梁启超，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，有的看一次就够了，有的看两三次就够了。”梁启超多少会为学生不能真心求学而动气，但他并不失望。他常拿时务学堂的往事激励自己：尽管只有四十多个学生，但中间却出来像蔡锷、范源廉、杨树达等人才。学生贵精不贵多，从前如是，以后亦如是。

对于常年追随梁氏左右的弟子而言，口音的理解便不再是妨碍，如此始可以感受梁启超授课的精髓所在。在这些弟子的描述中，梁氏讲课给人以天才横溢，兴会淋漓之感。最令他们叹服的，在于梁启超的博闻强识。梁启超一生最后一位及门弟子黎东方回忆说：“回想起来，像梁先生那



1924年，梁启超接待来华访问的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。

样渊博的人，才真正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。上下五千年，南北东西一万里，三坟五典、八索九丘，二十四史，两通鉴，十通，五记事本末，《太平御览》《图书集成》，难以数计的诗集、文集、笔记、传记、碑志被他顺手拈来，都成了他的妙论和注脚。”相比清华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王国维的治学精深，梁启超则可谓博大。面对王国维，学生感受到的是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；面对梁启超，则觉得“犹河汉之无极也”。

另一点常被记起的，是梁启超“生龙活虎一样的超人精力”。年轻的时候他便已习惯夜间写作，经常彻夜不眠。二十年代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处讲学和讲课，一年到头总不肯歇息，就连星期日也是如此。1921年应清华学校邀请，为学生讲《国学小史》前后连续五十余次。1922年到北京、济南、南京、上海、南通、武昌、长沙等地做巡回演讲二十余次。在南京一地，除每日到东南大学讲授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外，还分别为学校各团体及法政专科学校、第一中学、女子师范等校讲演。即使忙碌至此，还要每周抽出时间，到佛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。1923年，病中读《陶渊明集》消遣时发现问题，发奋三



梁启超 56 岁时留影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张照片。他寄给孩子们每人一张，并分别题字。

日作成《陶渊明年谱》。同年，为纪念戴东原二百年诞辰撰文，用一昼夜时间完成《戴东原先生传》；又连续 34 小时不眠不休，写就《戴东原哲学》……张君勱称“铁石人也不能如此做”，可以说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。

由于操劳过度，梁启超被查出患有心脏病。后又因误诊，被割去右肾。虽然身体状况不佳，梁氏自出医院之后，仍继续到各大学讲学，或伏案忙碌，奋笔疾书。一直坚持到 1928 年，身体实在无法支撑，始停止授课和各种公务。即使病势沉重，仍与“死神”斗争。在人生的最后一年，梁启超集中精力搜集宋词史料，并写成《跋（宋）程正伯书舟词》《吴梦窗年齿与姜石帚》《记兰畹集》《记时贤本事曲子集》等论文。临死前的数月，还拼着最后一口气，要撰述一部《辛稼轩年谱》。他常勉励学生“百行业为先，万恶懒为首”，在勤恳治学方面，梁氏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。

“报国惟忧或后时”：未竟的计划

梁启超晚年的忙碌和辛苦不肯为外人道，只是偶尔在写给儿女的书信中吐露心声。如他描述自己刚搬入清华时校课忙碌情形，说：“校课甚忙——大半也是我自己找着忙——我很忙得有兴会。新编的讲义极繁难，费的脑力真不少。”研究院初办之际，“百事须计画”。

两年后，清华功课有增无减，由于兼行导师制，每位教授担任指导十名学生，“这是由各教授自愿



国学研究院教师合影，前排左起：李济、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；后排左起：章昭煌、陆维钊、梁廷灿。

的，我完全不理也可以，但我不肯如此。”而梁启超同时间要指导十六人，出于责任感，亦“不好拒绝”。加之又接受了司法储才馆的任命，需要每周讲课指导，这些工作当然都是梁启超可以推辞掉的，但他不如此做，只是在信中吐吐“以后我真忙死了”之类的苦水。

清华之外，又因为燕京大学的师生请他过去讲课，“热诚恳求”之下，“也不好拒绝”，由此也就“真没有一刻空闲了。”如果说指导清华本部的学生还在工作责任范围内，那么接受燕大的邀请，就只能以他的热心肠来解释了。

在学术上，他充满理性，推崇“科学精神”；但他又是极为感性的人。只要是真心求学，喜欢热爱他的演讲，他都不辞辛苦予以回馈，“兴致勃勃，不觉其劳”。有一年冬天，梁启超到旧众议院做了数次学术演讲，每次都是座无虚席。在寒冷的冬日，开不起火炉的情况下，全场肃静无哗，认真听讲，令梁启超大受感动。他后来在家书中写道：“我常常感觉我的工作，还不能报答社会上待我的恩惠。”

若说梁启超晚年远离政治，埋首学术，是不恰当的。周传儒在1928年初曾写信给同学谢国桢，讲

到自己的老师梁启超时，就感慨梁氏冒天下之大不韪，重回政坛，犹如“入井救世，徒自苦耳！”

梁启超的政治计划在国学院师生间已不成秘密，“急于成事”的他疏于休养，也是众所周知的事。对待疾病，他一贯如此随意，这一次也以为过段时日自无大碍，可惜不能如愿。

梁启超于1928年9月10日病笃，无法继续工作。27日入协和医院，住院期间，托助理储皖峰帮忙搜觅稼轩资料，储氏每来省视，梁启超辄询问进展。无意中获得《信州府志》等资料数种，可作为著述之助，便不待病愈，携药出院，回天津执笔续草《年谱》。直至10月12日力不能支，一病不起。当时《年谱》方写至宋宁宗庆元六年稼轩六十一岁时，《祭朱晦庵文》即作于本年。全文已佚，《宋史》稼轩本传录有佚文四句存世，其文曰：“所不朽者，垂万世名。孰谓公死，凛凛犹生。”此“生”字即为梁氏所书最后一字，他的生命至此走到尽头。辛稼轩与朱熹，一词人，一哲人，是梁启超最敬重的具有高尚道德人格的名士先贤。这十六字，犹如任公的辞世诗，也是他的墓志铭。❶

【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】